

1984

海康文史



2
1984

广东省海康县政协文史组编

1984年12月

海康文史第二期目录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洪毓清整理 (1)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康革命斗争片断
- 海康农民运动先驱——黄杰 洪元 (4)
- 塘仔村风云录 蔡庭 (7)
- 参加南路抗日学生队的点滴回忆 王平波 (11)
- 名高望重说观楼 (上) 黎也松 (13)
- 热心地方建设事业的许克生 王保禄 (17)
- 《旧街·新街·许克生》一文的更正与补充
- 擎雷水不是南渡河的辨析 曹建华 (18)
- 雷州城与海康县 宋锐 (19)
- 雷州方言本字考 蔡叶青 (24)
- 从谚谣到雷州歌的历程 阿松 (27)
- 雷州歌音乐 詹南生 (34)
- 海康 (1928年—1948年) 体育活动纪事 吴流 (41)
- 海康印刷业简史 郑培兰 (43)
- 抗日前后的雷城工商业 蔡声扬 (45)
- 雷州的北和“仙桃”(芒果) 唐仕明 (47)
- 特倡塘史话 詹南生 丁崇正 (48)
- 鼠疫流行话当年 蔡明典 (54)
- 汉奸符永茂被捕杀经过 海士心 (55)
- 补白二则
- “万山第一”石刻, “马跑泉” 编者 (57)
- 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实物照片 (封二) 县博物馆 邓杰昌
- 汉代陶罐实物照片 (封三) 县博物馆 邓杰昌
- 封面设计 符运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康革命斗争片断

洪 航 清 整 理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海康党组织被彻底破坏了，党的好儿女陈培才、黄杰、陈凤鸣、黄河（女）、冯克等相继牺牲。但革命的人民并不被征服，共产党的伟大形象依然深印在人民的脑海中，革命斗争从未停息。

那时候，海康的反动派非常嚣张，自镇压东海仔起义后国民党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二营勾结海康民团到处“围剿”有共产党员和有农会的村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妄图“斩草除根”，扼杀革命。一九二七年九月七日，民团头子陈必发又把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农会骨干宋端、柯邦能等二十九人集体枪杀，海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有的共产党员（如杨沫水等）出逃外地后，脱离了革命，有的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而一部份农军仍然拿起武器，同遂溪县党组织领导人陈光礼、薛经辉所带领的遂溪农军一起撤退到斜阳岛，把早已在斜阳岛上落草的符振岳（海康县草刺园村人）那支人马编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陈光礼（一九二九年，曾任中共海康县临时县委书记的薛文藻上岛后任副总指挥），第一营营长符振岳，第二营营长薛经辉、余道生。农军在岛上公布“安民布告”，提出，“打倒蒋介石，为国为民除害。”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农军平时除进行军事训练外，还开荒种地，出海捕鱼；女战士和家属则搞农副业、种地、放牛、喂猪、养鸡以及缝补衣服，当炊事员等。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农军先后回师乐民、余村、桂坡、江洪、安铺等

地。一度打进遂溪县城，把敌人追击到麻章，毙敌多名，缴获不少武器弹药，还处决了反动分子，打开监狱，解放被囚的群众几百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当时，南路绥靖专员陈章甫曾多次派兵“围剿”，但都被农军打退。后来，敌人对岛上进行军事、经济封锁，以致农军粮食、弹药来源中断。一九三一年，总指挥陈光礼离开斜阳岛，准备到海南岛寻找党组织，不幸中途被捕，牺牲于海口市。副指挥薛文藻携妻逃出斜阳岛（后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当过海康、遂溪两县的伪县长）。岛上农军就由薛经辉指挥。一九三一年农历五月十二日，陈济棠派独立第三团在李基文率领下，再犯斜阳岛，又被农军打退了。农历十月初八日，陈济棠、陈章甫又增加兵力，并派其亲信林延年（伪参谋长）在硇洲岛指挥海陆空三军，向斜阳岛围攻，农军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符振岳壮烈牺牲，余道生等砸枪跳崖，农军大部份阵亡。最后，薛经辉等四十余人被俘，全部在北海市慷慨就义。

雷州人民武装斗争暂时被镇压下去，党的南路各级领导机关不断遭到破坏，以至整个南路党团组织和上级党委中断了联系。但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政策并没有吓倒向往革命的人们，反而教育了群众，使人民看清楚了蒋介石彻底背叛孙中山所提倡的三大政策，而投靠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早在一九二八年前后，“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

文化在海康的省立第十中学已大量传播。新文化运动作家胡云翼（出版过《西冷桥畔》、《宋词选》等作品）来到我县的省立第十中学当教师，他给学生们讲新文艺，介绍新文学作品。学生们积极阅读陈独秀、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蒋光赤、吴虞等人的著作以及左翼作家联盟的“左翼文学”、“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等进步报刊和小说。他指导学生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出墙报、办校刊。在进步教师的指引下，学生对国民党政府屠杀人民，投靠和勾结帝国主义深为不满。对国民党政府限制、禁止和剥夺学生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则采取不同方式不断地进行反抗，对校长周烈亚压迫学生，继续斗争。在一次罢课潮中郑为之（遂溪人）等被学校开除了。

一九二九年，郑为之等为寻求革命真理，到上海学习。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认识了进步诗人柯仲平，“九·一八”事变前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县进步青年何仕榜，一九三一年初在上海读书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上海组织“雷州旅沪同学会”（同学会的房租、活动经费等都由何仕榜、何仕梅等支付）团结雷州旅沪的进步同学加入我党组织的“上海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会员，在上海宣传发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旅沪同学会”曾在上海市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国集会和游行示威。一九三一年七月何仕榜任中共上海法南区马浪支部书记，郑为之任支部宣传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何仕榜调去学习特种技术，准备送去中央苏区工作，后来失踪了（有的说何仕榜往苏区途中牺牲了，但还未得到证实）。我县青年何仕梅于“九·一八”事变后，经郑为之介绍在上海法南区马浪支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从南方中学转到沪西学校就读，一九三八年前回广州，后无消息。

欧济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后来返海康搞农民运

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为了反抗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又回海康组织农民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毕业后，欧济民虽然留在上海工作，但他非常关心家乡的事业。在白色恐怖中的海康人民惨遭官兵民团的摧残，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反动头子陈章甫、陈翰华等为了掩盖其刽子手的面目，企图利用陈文玉之名在雷城旧参将署东的箭道（今为海康县党校校址）筹建陈氏宗祠，进行宗族串联，笼络人心，搜刮民财。欧济民在《留沪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陈文玉诞生的文章，揭露陈章甫等的阴谋，论证了神化陈文玉，是利用封建迷信欺骗人民，什么“重生”、“升天”是为其丑事进行辩护和掩饰。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反动阶级对历史人物神化的哲理。这一篇反封建主义的檄文，在海康流传甚广，反动派对此如临大敌。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当时广州市伪公安局长何萃即串通陈章甫，派宪兵到松竹区欧宅村将其逮捕，杀害于雷城的北校场。还下令海康何某以每本十块大洋的高价把《旅沪学报》收回销毁。

真理是埋没不了的，革命志士也是杀不尽的。海康革命青年在省立第十中学（后改为雷师）对反动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从大革命失败后至一九三四年“十中”曾闹过多次反对反动校长压迫学生、压制民主、禁锢自由的学潮。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黄其江、陈其辉、唐才猷、王文劭等曾在“十中”组织一个读书会，邓麟彭、陈兆荣、黄彪、宋锐等二、三十人参加。读高尔基、鲁迅、矛盾、丁玲、郭沫若等人的文艺作品和马列主义理论。为了宣传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读书会的部份成员还用各种各样的笔名投稿，把《雷州民国日报》的副刊“包办”了。他们写的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作品的内容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故事，激发人民抗日情绪。写稿得来的稿费，由读书会汇往

上海租界购买进步书籍，互相传阅。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县城各界在体育场召开“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当时国民党党部头子池天璜发表反动言论，反对学生抗日活动，为国民党反动派“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辩护，激起学生们的义愤。读书会的成员陈其辉，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揭露国民党官僚胡作非为的罪恶。事后，使国民党党部头子池天璜狼狈不堪，大长进步学生之志。这个反动头子恼羞成怒之至，妄图勾结国民党驻军营长张鼎光搜查雷师。后来，学期一结束，陈其辉等就被迫离开学校了。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给雷师进步青年学生极大鼓舞，同时传来了《读书生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和刊物，读进步书刊的人越来越多，这期间黄其江、唐才猷等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使大家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知道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大家更加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于是一致要找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初，黄其江在广州听人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有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找到共产党。后来有人说，香港有人到惠阳开钨矿，要招收工人。于是，黄其江从广州赶回雷师，同邓麟影、唐才猷、沈汉英、黄彪、谢兆勋等商量，决定大家分批去找共产党；路费如何解决？唐才猷慷慨解囊，毅然和家庭决裂，回家把妻子和二嫂的金链、金镯、金戒指等金器一大包，兑了港币，分两路去香港。唐才猷等人从广州、黄其江和邓麟影从江门往香港。到香港后，听说因开采费用过高，钨矿倒闭了。这时他们带去的钱也花光了。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广州的陈济棠和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等公开反蒋，在香港报纸上登出广告，公开招聘，在广西办“青年抗日军官团”。有人说，“李、白反蒋抗日，一定和共产党有联系。”于是黄其江和邓麟影又回东海岸筹备路

费，通过陈其辉、黄明德等筹款一百多元，交给一个人（是海南人），先到广西去联系，当他到广西郁林时，李宗仁、白崇禧等向蒋介石投降了。共产党还是找不到。

在迷惑中，他们从《读书生活》里找到答案：要在群众中做实际工作，团结教育更多青年起来革命。所以他们决定回到学校去教书或读书。而唐才猷偷了家庭的钱，怎么回去？但他为了革命事业，暂时忍辱。回家后，被父亲痛打一顿，关在炮楼上达一年之久。在家里唐才猷博览群书，革命意志更坚定了，还教育了每天给他送饭的长工唐荣益也参加了革命。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七年初，陈其辉、黄其江等先后到广州江村师范读书，在学校参加了进步的秘密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党员教师刘秉钧领导下，组织乡村抗日救亡工作队，下乡举办民众夜校，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不久，我县青年吴华（又名吴济生，在北京政法大学时领导过“一二·九”运动），受刘少奇同志委派回广东工作，担任广东省青委书记，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吴华任总队委员（一九三九年三月任总队组织部干事）江村师范进步学生黄其江陈其辉等七十多人加入抗先队。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同志给他们做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等报告。一九三八年六月，刘秉钧介绍黄其江、陈其辉入党。下半年黄其江返雷州进行革命活动，在海康吸收我县青年王文勤入党。一九三九年六月王文勤等返雷师介绍唐勤、肖汉辉等入党，建立党支部。从此，中共海康党组织又象野草迎春风，茵绿了全县。



海康农民运动先驱——黄杰

洪 元

编者按：黄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海康的革命事业做过重要的贡献。他为捍卫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意志，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年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特发表本文，以告慰英烈，激励今人，教育后代。

黄杰是中共海康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康农协会的组织者。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领导我县农民暴动后被敌人逮捕，而于农历十月初六日壮烈牺牲。黄杰的一生，在海康的党的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黄杰，字子全，又名虎臣，因此人们都叫他做“虎”。 “虎”的形体魁梧，沉默寡言，善于思考，办起事来勇猛如虎，既有韧性，又有干劲。他于一八八四年的旧历九月十六日出生于海康县东洋乡北营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力求上进，一八九六年，曾到邻近的土角村私塾读书。当时目睹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农民的悲惨生活，深感不安。如何改变官匪为患和地主盘剥的现状？他时刻在思索。清朝末年，革新官员提出“废科举，办学堂，以兴国邦”。一九〇四年黄杰便抱着“兴邦”的愿望，考上了县城官立高等小学堂（校址设在西湖濱元书院内）。后来又在雷阳中学堂接触了新文化，开阔了眼界。毕业后，应海康县城黄景星创办的道南印务局的聘请，当了《粤南名联》的采稿员，《粤南名联》初集的出版是有他的辛勤劳动的。他希望通过印刷业发展海康文化事业，繁荣“国邦”。因此，他撰写了“道心印证大千界，南合文明第一楼”一联，以祝贺道南印务局的成立，赞扬“道南”印务局对海康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一九二二年他变卖家产与温某等合股经商，由于商品被土匪抢劫一空，黄杰一万四千五百

大洋的股金被温某等所侵吞，从此，他打算以办实业来繁荣海康的想法破灭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黄杰由于和温某等人的债务纠纷而被迫前往广州。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等正在广州，广州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正在风起云涌，黄学增等领导的“雷州留穗同学会”极其活跃。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数千工人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的警律取得胜利。黄杰在广州呼吸了新的政治空气，在彷徨中找到了共产党，并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决心投身于革命洪流。一九二四年八月廿一日他被选送到罗绮园等主办的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在农讲所里经过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进行社会调查和革命实践，黄杰受到严峻的考验和严格的锻炼，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世界观起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农讲所有过这样的记述：对学员“先行军事训练，看谁耐苦，不畏艰难；绳以军纪，看谁能服从团体动作。”在学习期间，有的人决心不大，不能吃苦而逃跑或申请退学。半个月内农讲所的学员从二百二十五人锐减到一百六十人，黄杰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坚持下来了。

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唆使反动商团鼓吹罢市。为了保卫革命政府，农讲所决定将

全体学员编为“农民自卫军”。这时，黄杰等成为广东省第一批农民自卫军的成员，移驻省署。在省署一边学政治，一边学军事。经常为他们上课的有中共广东党各部门的负责人潭平山、罗绮阁、阮啸仙等。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为了巩固革命大后方，黄杰等农讲所学员赴韶关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疾苦，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会和自卫军。在韶关聆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孙大元帅勉励他们把农民发动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指出：宣传比武力更为重要，以力服人者一时，以主义服人者始能永久。

九月三十日黄杰等返广州继续进行政治理学习。就在这个时候，黄杰经过考验，参加到青年团组织，后来转为党员。正如当时阮啸仙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此届学生分子很不错，初授以军事教育，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即所谓农民自卫军是也。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功效，并使我得到一个经验：一个革命家，如果受到军事教育，必更能守纪律，勇于任事，可使添去书生习气，而为一不折不挠之使者。不过政治训练要与军事训练并重，才能养成全材，现在该所正在政治训练期中。计百六十人，同志占廿人，新参加入者十余人，在训练中准备收入者三十余人，我们意想中将有百人可做同志……。”根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对《S·Y·（按：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与C·P·（按：中国共产党）关系议决案》中规定：“S·Y·各地方应速吸收二十岁以内青年，下届全国大会应修定年龄，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岁。”“已过S·Y·法定年龄的团员，应由C·P·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此项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C·P·……”而黄杰在农讲所学习期间已四十岁。按照当时情况和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规定，四十岁以下可吸收入团，超龄的还可入团，为“特别团员”作为转党的预备期，故一九

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子的青年化固然可用机械式的方法尽量把超过年龄的团员送入共产党，并且以后不再介绍超过年龄的入党。”所以，黄杰在农讲所毕业前夕转为党员。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黄杰从农讲所毕业后，被廖仲恺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为农运特派员，立即风尘仆仆地回到雷州搞农民运动。他是我县最早的农运领导人。当时军阀邓本殷统治着南路各县，劣绅、民团、土豪横行霸道，视一切革命活动为洪水猛兽，既害怕又疯狂镇压，伪县长陈炳炎曾布置追捕黄杰，所以黄杰只能秘密地到一区城角、四区务陵社，六区西宁、桥头、大桥、麻廉等四十一个乡组织农会。陈炳炎退职后，黄杰加入海康民间组织“雷州改良蒲包会”为演说员，以这个公开身份为掩护，走遍全县乡镇，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剥削农民的罪行，教育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黄学增在遂溪第六区墩文乡主持成立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这是雷州第一个党团支部），黄杰被选为支委。从此“雷支”直接领导海康、遂溪两县工作，在“雷支”统一领导下，海康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发展；邓本殷军阀势力退出遂溪时，黄杰还到遂溪第四区（包括城月、寇竹、五里塘、土扎一带）搞农会工作，曾成立四个乡农会。当时经黄杰组织起来的农会会员有三千余人。

一九二六年元旦，“雷支”在海康县城召开雷州各界庆祝琼崖收复广东统一大会，黄杰编写了《劝告全体农工歌》，热情地歌颂了国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实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歌词全文如下：“敬告雷州各民众，一切兵农商学工。革命军共民合作，乜事无由不融融。伊为救民苦愁，肃清土豪征西东。土豪劣绅概打倒，军阀横行更不容！帝国主义思蠢动，走狗时常暗勾通。看邓本殷这首恶，总霸八属入牢笼。革命军，誓不与伊同天共，救出雷

民水火中。伊甸琼州图占据，现将收复闻声哦。偌体广东归一统，北伐旗扬更威风。凡有民族受压迫，总联起，世界定然见大同。人人合力就有用，最占多成是农工。由此去，各县区乡设农会，无论已田租田雇工都同类。大家联络共设农团队。总要村村能自卫。又相互救莫推诿，万众一心结成堆。无给富主勒租贵。都邀手艺打工伙计同心水。设会相帮志莫退。蜈蚣足多都可畏。以后有谁勒索欺负债人，就将条命卖伊配，认真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件主义莫违背。革命军，中华国，雷州人，农工界，三呼万岁万万岁！啊，永享升平大光荣。”这首歌在海康流传甚广，鼓舞了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此各区农会相继成立。

一九二六年四月海康支部成立，黄杰被选为支委。四月十七日海康县农民协会成立，黄杰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当选为委员，主持农会工作。会后，海康县农协会和遂溪县农协会发表联合宣言，公开宣布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省港罢工、暗杀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以及勾结军阀的罪行，指出：“为使中华民族之完全解放，为使农民自己阶级完全解放……要联合全县全省全国全世界的农民兄弟，姐妹，革命军人、觉悟学生和其他一切革命分子”“打倒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拥护省港罢工！”四月廿四日，黄杰等又组织了各区农民自卫军五百多人全副武装到县城举行成立大会、阅兵活动和游行示威，大长农民志气。此后，海康农协会会员就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了。

黄杰在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农会建立的初期，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到处造谣破坏，说成立农会是为了征收租税，威胁和恐吓入会的农民。有一次，县城大地主梁春熙无理殴打农民，黄杰知道后，非常气愤，马上派农会会员把梁春熙抓起来游街；从此地主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群众拍手称快。地主看见农会权力越来越大，有的

逃到香港、广州湾等地，有的千方百计钻进农会，企图窃取农会领导权，改变农会性质。海四区肇榄乡大地主卓子善钻农民未充分发动起来的空子，混进肇榄乡农会，当选为肇榄乡农会会长。黄杰在审查会员时发现，立即下令开除卓子善会籍，取消卓子善农会委员长和区候补委员职务，并责令各级农会遵照农会章程审慎办理，严防不良分子钻入农会。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发展农民运动。

“雷支”在黄学增指导下，在国民党海康党支部（即旧府圣宫东边的文昌楼——现在三小）举办雷州农民宣传讲习所。黄杰亲自给学员讲课，为各地输送了一批农运骨干。从此，海康农民运动象干柴遇烈火，烧遍了海康每个角落。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四·一五”事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海康的反动派上下配合对共产党员、农会骨干和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黄杰于五月间到遂溪乐民一带和黄广洲、陈光礼等发动第一次农民暴动，准备组织力量，配合行动，攻占县城。由于海遂两县反动派在五月十八日会合防军“围剿”而暂时停止斗争。不久，黄杰等被列为要犯布告

“通缉”。但黄杰并不为穷凶极恶的敌人所吓倒，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六月下旬，为配合黄广洲、陈光礼率领遂溪农军在乐民的第二次起义，与苏天春、陈靖才等到东海仔（东里一带）组织农军在淡水村蔗果岭举行暴动。黄杰领导农军攻克了官贤民团据点，缴获一批武器后，又在东里沿海打垮了民团武装，俘海关哨船两艘，获大洋、铜仙无数。后来，民团头子陈必发组织各区民团一千余人，勾结广州湾法帝国主义在硇州的巡洋舰，从四方八面夹攻起义农军。陈靖才等一百余人英勇牺牲后，黄杰率领一百余农军突围，准备撤退到雷州西海岸与黄广洲等领导的遂溪农军汇合。当队伍到达北和时，遭到民团的伏击，黄杰等带着八十多人撤入附近的覃本山，在山中一个多月，粮

塘仔村风云录

蔡庭

塘仔村是我县松竹区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自然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塘仔村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县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单上就有塘仔村的方茂盛、方妃荣、方三哥、方妃革、方妃德、方李生、卢妃二七人，他们是塘仔村英雄儿女的代表。塘仔人的斗争事迹是感人的，是值得记入史册而世代流传的。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广大青年学生纷纷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塘仔村知识青年方茂盛当时正在雷州师范读书。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于一九三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很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进步的书

报（如《论持久战》、《救亡手册》、《游击战术》、《方志敏自传》、《新华日报》等）带回村里，向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方茂盛同志为了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就利用群众习惯，在村内搞了一个党的地下群众组织——兄弟会，会员发展到四十多人。这个会提出了互助互救、反对压迫的口号，为发展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武装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六日，日寇的魔爪伸到海康，国民党反动派一枪不响便弃城逃命。海康沦陷后，日寇、汉奸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的招牌，对群众敲诈勒索；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又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群众

尽弹绝，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和出路，黄杰出山探听消息，寻找联系，不幸在扶茂村（现在龙门区淘汶乡）被捕。民团把他押回雷城的“仙城会馆”（现在二小内）监禁。敌人在审讯中软硬兼施，用尽一切刑法，黄杰坚贞不屈，始终不向敌人开口。敌人无可奈何，便对黄杰处以极刑。临刑前，敌人把他拉到游街示众。黄杰全无惧色，沿途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他正气凛然地说：“我希望海康有好多的‘虎’，我黄杰没有白白地死去，请看十七年后吧！革命一定会胜利！”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被黄杰的英雄气概震慑了，频频地打他的脸，堵他

的口，但怎么能堵住革命者的信仰和人民对英雄的敬佩呢？刽子手把黄杰押到西湖桥边，慈荫亭后（现在人民医院门诊部附近）拳打脚踢，妄图强迫他跪下，而黄杰始终巍然挺立，刽子手开枪了，他昂首怒视，宁折不弯，罪恶的第十三颗子弹穿过英雄高大的身躯，这时对革命无限忠诚、宁死不屈的好党员、海康农运的领导者黄杰同志才倒在血泊中。

黄杰同志牺牲已经五十七年了，他为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他寻求真理，捍卫真理而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的苦难日益深重，这时，他们是多么渴望着救星的早日到来！

塘仔村象一颗在黑夜中闪亮着的红星，把许多抗日的志士仁人吸引到村里来。

这时，中国共产党派到塘仔村来从事抗日活动的革命同志越来越多了。他们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有的奔赴嘉山岭，有的前往徐闻县，都经常路过这里。经常住、吃在方茂盛同志家中的是庄梅寿和陈醒吾两位同志。其次便是王德才、翁泽民、支仁山、陈开瀛、周立人、欧汝颖、林子凤、陈兆昌、唐勤、王如茂等同志。在村中首先参加革命活动，探敌情、当交通员的是方联珠、方雨其、方春炳、方进等二十多人。两个交通联络站就分别设在方春炳和方联珠的家中，并由他俩负责交通联络工作。此外，还在方俊汉家里设立机械修理厂，制造和修理枪枝。

一九四三年四月，陈醒吾、翁泽民、庄梅寿等同志在方茂盛家中组织起塘仔村联防自卫队——海康县第一支抗日革命队伍。队长由方茂盛担任，枪枝由塘仔村提供，队员都是塘仔村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杨家区坡塘圩一带。

接着，陈醒吾、方茂盛等同志加紧活动，把一九四〇年成立的兄弟会从四十多个人发展到七十多人；对骑在人民头上而群众恨之入骨的恶霸方拔南进行斗争，使他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以激发群众的斗志，提高群众的觉悟，从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就在这年冬，为了瓦解敌人，扩大革命力量，陈醒吾、庄梅寿、方茂盛等同志利用伪和平大队长莫荣光与伪和平队司令符永茂的矛盾，派兄弟会与游击队的人与我党派在莫大队中当队副的唐协森（绰号山贼唐）同志取得联系，里应外合，连夜把他们的步枪一百多枝及子弹一大批，悄悄地运到塘仔村藏了起来，以供我党发展革命武装之用。符永茂查不出这批枪枝弹药的去向，就把莫荣光吊起来吊打。莫荣光哑巴吃黄连，怨气冲天，敌伪内部的矛盾从此加深了。

符永茂死心不休，于农历六月初六派伪

大队长袁希明带了一百多伪军围剿塘仔村，该村群众受到了惨重的洗劫，而我方部队的处境更加困难。这样，方茂盛的队伍只好露宿在草郎大岭、深山腰一带。好在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血肉相连，部队的给养，全由塘仔群众想办法解决。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连购买草鞋、竹笠都很困难。塘仔人不便出来购买，就通过赤步村陈文瑞代办，白天，不便接触部队，就乘黑夜或滂沱大雨之夜冒着生命危险把东西送给部队。表现得最为顽强的是方妃禄、方春炳等同志。这支队伍在海康活动一个时期后就转到遂溪去了。

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为了保护革命村庄，塘仔村又组织了一支拥有四十多人的村队，由方玉明当队长，进行巡逻放哨和配合部队执行任务。

随着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一九四四年秋，支仁山、方茂盛等同志带领的部队重返海康。首先，在英楼缴获了反动派邓汝焯的赃物——花生油。接着到唐家区果宅村袭击反动头子邓汝焯、邓武，惩办了横山村的恶霸三王和北样村恶霸北样爷。敌人的威风扫地，革命群众扬眉吐气。这个时期，我部队所有伤病同志都顺利地运回塘仔村医治疗养，群众对这些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当时，李芳运、唐多惠等同志病情非常严重，但在群众亲如兄弟般的照料下，很快就恢复健康重返部队了。

这一年的冬天，党派周立人同志到塘仔村加强领导工作，从兄弟会的骨干中挑选出方玉珠、方进等二十多人，成立游击小组。

与此同时，我党为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在海康东洋一带组织了一个武装中队，队长陈章，指导员王文劭，由方茂盛同志把队伍带回塘仔村。紧接着，又派方春炳先和支仁山部队联系，两支队伍才于晚间会合起来。

由于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又不断摧毁反动堡垒，反动势力对革命武装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一九四四年冬，一些村庄的地主恶霸如龙马村地主恶霸陈正濂、陈正极、陈明

德等，便与敌伪勾结，公开和我们对抗。我们部队向他们要钱要粮，他们不但不交，反而组织了和平队第十七中队，由陈正极当队长，把龙马村割据起来，并扬言要把共产党消灭。面对这一情况，支仁山、方茂盛、萧汉辉等同志便带领部队连夜袭击龙马村的地主恶霸。

一九四五年初，我们抗日游击队二百多人从徐闻回师海康，决定乘敌不备袭击盘踞企水的反动武装谢云赏中队。这时，方茂盛同志从部队回到塘仔村，派方春炳去扶桥，通过纪继尧派纪久智化装成鱼贩，先去企水侦察情况，然后于第二天晚上急行军赶到企水捣毁反动头子谢云赏经营多年的巢穴，从而增强了人民对革命的信心，刹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五年春，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九独立大队在扶桥成立，队长方茂盛、政委李晓农（后由陈震吾继任），大队副徐××、副官方联珠，一连长李芳运、指导员王荣、副连长陈孙式，二连长马康胜，指导员沈兆炎，副连长廖文廉，政工队长方春炳（后张典乔继任），短枪队长方玉珠（后沈信继任）。这支队伍由二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塘仔村就有七十多人参加。他们活动在杨家、南兴、龙门、松竹等地。

龙马村反动地主与敌伪勾结，对革命威胁很大，为了打击敌人巩固革命根据地，同年二月，塘仔村村队配合部队，在支仁山、方茂盛、李昌菊等同志的指挥下，在塘仔村祠堂设下埋伏，逮捕了去松竹赶集的龙马村地主恶霸陈明德等九人。敌伪为了保护封建势力，维护地主恶霸利益，于三月十七日，由和平大队长陈龙门、和平队第十七中队长陈正极，大地主恶霸陈正森等带领汉奸和平队及其爪牙狗腿三百多人，乘夜“围剿”塘仔村。当时村中只有村队把守，由于革命同志指挥得法，敌人无计可施，就到海康城报告汉奸头目符永茂，纠合各地和平队“增援”，对塘仔村猛烈进攻。由于敌众我寡，终被敌人攻入村内。敌人无恶不作，抢掠奸

淫恣意杀戮，还捆绑八十多人，严刑吊打。但群众忠贞不屈，被殴伤亡者达五十二人之多。在战斗中，游击队员方妃革等壮烈牺牲；方岳生的爱人也受枪击重伤。我们的部队获悉后，王建涵、方茂盛立即带领部队返回援救，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伪和平大队长陈龙门被子弹击中其脚，敌人这才狼狈逃窜。

到了三月二十日，日伪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又集中四百多人，全副现代化装备，由汉奸符春茂带领，耀武扬威地赶到塘仔村来。这伙兽兵，灭绝人性，连七十岁的老太婆也进行轮奸。敌人的疯狂扫荡，激起了塘仔人民抗日救亡的最大义愤，他们就更加积极地支持和参加革命队伍。

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方茂盛同志带领的部队，在各地发动群众，以塘仔村为中心，发展到扶桥、王排、松柏洋、信村、东坎等十四条村庄，并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扶桥祠堂里成立海康第一抗日联防区。区主任是纪继尧，副主任王道深，常委有方野、王如茂、郑成焜、方春炳等人。同时成立了联防大队，吴辉任大队长，黄葵任政委，秘书宋寿彭，第一连连长王美生，第二连连长廖文廉。

抗日联防区的工作很活跃，有群组宣传队，编贴《农声壁报》（由方春炳、郑成焜等在扶桥东村祠堂编写出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报道联防区和部队活动情况；有制造地雷工厂，由张配友同志负责当技术员。此外，还在扶桥铺仔设立税站，负责人是方春炳。

一九四五年五月，伪军与龙马等村反动派配合，伪装日本鬼子，向第一抗日联防区进行大扫荡，敌人采取闪电突击方式冲入扶桥东村，烧毁部分房屋。多亏方茂盛同志带领的第九独立大队闻讯从富行村急行军赶回配合联防大队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此后，独立大队还帮助群众的双夏忙工作，军民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由于日伪对塘仔村进行扫荡，一些村庄

的地主恶霸又蠢蠢欲动了。如松竹区东角村反动头子曾同容组织武装，准备把七庄割据起来，疯狂叫嚣“不准共产党踏过大边桥”，杨家区北坡村反动头子李汉华准备组织一个伪和平中队以反抗共产党。为了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一九四五年夏，塘仔村队配合部队，往杨家区井尾村逮捕大官僚大恶霸陈书云（被发觉逃跑）。接着乘夜派方玉珠、方伟成等八人到东角村捕捉曾同容，迫其低头认罪，交出长短枪三十多支，子弹一批。之后又逮捕了北坡村反动头子李汉华。这家伙非常顽固，不但不缴枪，而且勾结和平队偷袭我部队，我们就把他枪毙了。

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投降后，南路抗日游击队集中到海康第一抗日联防区和第九独立大队会师，准备接受日寇投降。这时群众喜气洋洋，以为此后能过和平的日子了。谁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指使日寇拒绝向我们投降，一方面集结大量反动武装向第一抗日联防区大举进攻，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独立大队和联防大队奉命撤出联防区进行整编。除老弱病残和工作需要而留下外，其余都随一团西征。塘仔村有方茂盛、方联珠等十多人参加而征，是海康参加西征人数最多的村庄。

我们部队撤出后，国民党反动派就象饿狼恶狗横冲直撞，对抗日联防区的村庄大肆扫荡。塘仔村，仅农历八、九月份就被围剿七次。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反动派乘秋雨淋漓，堵塞涵道，使积水泛滥村中，造成房屋倒塌，为状之惨，有歌为证：

共产打败日本鬼，
声讯传来喜眉开。
心里想，这次安居得乐业，
胜利回来我家园。

谁知到，暴虎霸道恶狼回，
国民党，班贼回来更受亏；

四五年间八九月，
七次围剿我家园。

门板扉缸也受亏，
饭碗凳头总劫光，
堵巷水深屋崩净，
无屋无人又无门。

塘仔村群众逃散后，反动派还不罢休，仍然到处搜捕。一九四五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就被搜捕了五十多人，恣意殴打之后，因伤致死的有方莘才、方玉保等二十多人。

为迫使塘仔村人没有藏身之所，国民党反动派又下令“清乡”，使至爱亲朋也不敢收留他们。这样，塘仔人露宿风餐、饥寒交迫，发病死亡等事故就不断发生了，前后死亡的共计五十多人，仅方同来一家四男一女全部死亡。孕妇在风雨交加的坟堆、溪边分娩，方桥生、方墓顶等名字就由此而得。

至于逃难到徐闻、东海、江门等地的不是做苦工，就是行乞。方昌活等三十多户还卖儿卖女来维持生活哩。

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幸存的群众才陆续回到村中。塘仔人虽然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摧残，但他们的革命意志却更坚定，胜利的信心更足，对敌人更加仇恨，对党无限热爱。

因病不能随部队西征的方则余和方春炳回到村中，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揭露反动派的罪恶，说明革命一定胜利的道理，以加强群众的信心。

一九四六年，塘仔村又恢复了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兄弟会，以进一步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党指派方春炳同志负责挑选方妃养、方妃武等二十多人分别在方兆和方少岩家重新成立游击小组，并在游击小组基础上组织帮工队，做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例如帮助参加老一团西征的方联珠、方春、方盛等的家属耕种好田地等等。

此外，方玉明、方妃养等人还利用亲戚关系，到龙门区睦堂村黄烈家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又带游培荣、周立人、王如茂等同

参加南路抗日学生队的点滴回忆

王平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到了1937年，又在我国河北省芦沟桥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步步后退逃命，祖国一大片锦绣河山就沦陷于日寇的铁

志到这里开展革命工作。

从一九四七年起，党又在方玉明同志家中设立了交通情报站，负责了解公平、松竹一带的敌情，及时汇报。同时，组织了村内的共产党员，游击队的同志到松竹、公平、竹桥等村张贴革命标语，散发各种革命文件及传单。

当时负责松竹、公平一带地方工作的方春炳同志，又以塘仔村为点发展革命力量。附近的松竹、内巷、洋山墩、山美等村庄的革命同志来塘仔村联系工作，汇报情况，参加宣誓。例如洋山墩吴炳权、西排村黄生、内巷村欧若水等人就是在塘仔村参加游击队宣誓的。还派党员方妃爵到雷城以读书为名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四八年春，党组织的学习文化班分别在方四、方兆等同志家中举办，有学员方俊均、方少高等三十多人。识字课本由方春炳编写，方俊汉、方兆任教员。课本内容生动形象，如“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富人欢乐”、“穷人愁闷”、“穷人整天劳动不休息，吃得缺，穿得破”，“富人整天玩乐不劳动，吃又好，穿又美。”结合实际，启发群众革命思想，因而学员的学习热情很高。

一九四八年夏，乌云又一次笼罩着塘仔村的上空——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塘仔村贼心不死，松竹乡自卫队五十多人，在漆黑的午

夜之下。不久，我省广州也跟着沦陷了。这时的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到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沦陷区人民在日寇的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前十九路军爱国抗日将领、后任广东省

夜率到塘仔村，借搜捕共产党为名，抢走财物一大批。这年八月间，松竹乡自卫队长属玉谷带领五十多人血洗塘仔村，打死方妃翠、方玉林等群众，又抢走大批财物。

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一九四八年冬，塘仔村队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方妃武关系收缴了东角步村林姓封建势力拥有的长枪六支，子弹一批来充实我们的武装力量。

塘仔村虽多次遭受敌人严重洗劫，但群众还是节衣缩食支援部队，仅一九四九年二月间一天就为支援前线而筹粮五千斤。

一九四九年初，王婉玲同志在玉殊家重新建立妇女会组织，成员有方翠章、方翠华等二十多人。三月，塘仔村队配合我十五团到松竹乡伪政府的粮仓，开仓救贫。

为配合大军南下，迎接全国解放，一九四九年春，成立了海康西区区队，队长是塘仔村方则余，队员中有方免、方炳华等十多人。

三十五年前，塘仔村的人民群众为了民族的生存、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用汗水和鲜血浇灌了胜利之花，结出了幸福之果，一大批的英雄的儿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条战线的骨干。今天，他们又满怀激情地经营着这块神圣的土地，要把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他们的光荣事迹是值得世代传颂的。

第七区专员张炎看到此种情况，忍无可忍，便于一九三九年组织起一支武装学生队，并以之为骨干，发动南路各界人民群众一致起来，进行爱国抗日斗争。他先派出人员前往申白、信宜、高州、化州、廉江、吴川、遂溪、容康（包括徐闻）等地招收爱国青年学生。通过考试，录取了一千多人，组成十个中队和一个妇女服务队。妇女服务队是由张炎的夫人郭坤麻（共产党员，毕业于厦门大学）领导。参加考试并被录取的有南兴王平波，城区潘光华，东甲陈汝源、郭新以及白沛、陈沛、陈沛三人共计十人。参加那边报名的也有海南参加考试，考场设在省立雷州师范学校内。徐闻考的有第一中、林株两人。被录取的学生跟招生的工作人员一起步行五天到达广州。海南、徐闻、遂溪的一部分和香港（仅吕再一人）、海南岛的学生约在第十中队。遂溪县一班学生则编在第五中队。十个中队则集中在红花庙一带。营房的屋和墙全是由茅竹搭起来的，房内卧床也是用茅竹织成的太平铺。

学生队之上，设有总队，非常兼总队长，另配一名付总队长（姓名记不起，共产党员）管日常工作。总队内任命许多教官和职员，教材是各任课教官编写。交书局印刷，然后发给我们学习。课程有：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发展史、国际形势、抗战时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等。教官有谢久（共产党员）、阮明（共产党员）、黄景文（共产党员）等。他们都是我党地下同志。黄景文讲授射击教范兼任第七中队长。

学习时间，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出野外进行军事训练、课目有：步法、队形变换、利用地形地物、各种姿势射击等。学习紧张而又活泼。

生活作风军事化。每个中队配有轻机枪一挺，每人发一支七九步枪，百颗子弹，一颗手榴弹，一张蚊帐，一张军毡，一张草席，一个背包；冬天发两套军服和一条棉背心，夏天发两套短袖军服。此外，还有一条风纪腰带，一个水壶，一个口盒，一顶海防

帽（通常规定戴向左倾斜），一双绑腿，每月发一双草鞋。上课、出操、上街均穿军装，着草鞋，扎风纪带。同学之间或上下级之间相遇时要互相敬礼。

纪律比较严，生活比较艰苦。吃的是大米、大头菜以及咸橄榄。但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当然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艰苦生活的磨练而逃跑到中队。在我们第十中队的几个海南同学就是如此。

学习告一段落，就下海南各地，如棋子、社龙、鳌头、公馆、石鼓、南楼等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白天演街头剧、广播，夜晚演抗日戏或群众合唱抗日歌曲，如《太行山进行曲》、《游击队歌》等。唱起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鼓舞了群众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民族革命精神。

在海南搞了一段时间的宣传活动，又回来集中学习，然后开往电白、信宜、化州、廉江、吴川、遂溪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遂溪黄略村同茂茂中学的学生交谈，第二天便开往赤坎寸金桥外宿营，广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救亡。1940年以后，以中队为单位分散下县；我们第十中队下海丰，在梅林头办分校，教群众文化、唱抗日歌曲等，群众颇为称赞学生队。然而，薛介石反动派却说张炎在南路组织大批青年学生搞“赤化”活动，下令解散学生队。在国民党当局的重压下，总队部清退了小部分同学出队，应付反动派，以便保留学生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但是，不久反动派一再对张炎施加压力，在寒涛滚滚，阴云密布的情况下，学生队毕竟保存不了。1940年下半年，就以结业的形式解散了学生队。在离开队伍各自前程之前，张炎总队长给我们每个人送一张六寸大像片和一本同学录，以资留念。

南路学生队的组织和活动距今已经四十多年。它当时教育和发动南路广大群众起来抗日救亡，保家卫国，和传播马列主义也传播革命的种子，做了一定的贡献。

名高望重说观楼（上）

黎也松

陈昌齐，字宾臣，号观楼；又署“峨荔居士”，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学问渊博、蜚声翰苑的学者。他出生于海康县调风坪那边的南田村，祖父大用，附生；父亲河书，恩贡生；虽出自“书香门第”，家境却并不富裕。

十六岁那年，他已是县学的一名附生了。父亲叫他到府城从师深造，每月给他生活费用不过一斗米和二百钱。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他矢志于学，不怕难，也不怕苦，费用不敷，便挤出时间为别人操作诗文或为人抄写，依靠这些“业余”收入以弥补所需。乾隆三十年选拔贡生时，校官因见昌齐家贫而不给他报名，如果不是县中一个老前辈仗义执言，为他力争，他是没办法参与考试的。

昌齐入穷愁不穷，在科举场上，中式举人，联捷进士，仕途虽然坎坷，官不显赫，而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却极其突出。他名高望重，影响一时，数我省当年学人也没有几个。

一、书无不读，学无不精

陈昌齐天资颖异，七岁读书，过目成诵，已有“神童”之称。到了十三岁，十三经背诵如流，更为令人惊奇。然而他的天赋好，固是他钻研学问的有利条件，而他不怕艰难，勤学苦练，更是他学识日广、造诣日深的主要因素。

他在北京当官之余往往白天给学生讲课，批改诗文，夜里又挑灯苦读，更深漏残，依然左图右史，手被口诵。一在书肆发现心所酷爱之书，必然千方百计把它弄到手来，

那怕是典衣节食，也在所不惜。

乾隆五十年（1785），在翰林院大考，为大学士和珅所压抑，被放在第三等，降为“编修”。本来，“中允”按例是降为“赞善”的，而昌齐却自清降为“编修”，掌院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家贫，想得到实俸，而且，当编修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所以不计较品级的高低。”为了读书，官不官，他是满不在乎的。

他，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精。在封建时代，一般学者所必修的经史子集之类的书固然认真下过一番功夫；就是文学、音韵、政法、赋税、医药、地理、数学、天文以至百家众技之书，都做过专题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曾对人说，读书应以经史为根本，而以诸子百家扩大知识面。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所以，他的殚见洽闻，实在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

经史学家都晋涵的《尔雅释义》一书，到现在还是众所周知的一部研究训诂学的重要著作，可是，谁曾知道在这部书里也有陈昌齐的殷勤劳动呢！当年，他曾应作者的要求，审阅全部稿件，并为之纠正三十多条。

戴震这个人，论学是少赞许而多批评的，可是，他却心服陈昌齐。他所注的《水经注》，陈昌齐看过原稿后，也曾给他指出多处。只是后以限于官书，未能改版，这件事曾使戴震耿耿于怀，引为终生憾事。

陈昌齐乐于助人也如此。他尤其喜欢快植后进。对就学生徒以及登门求教之人，随问随答，终日不倦。往往旁征曲证，务使疑者释然，惑者恍然乃契。因此，海内之人争先恐后地望门晋谒。有的想要一决疑难，有

的想要一见其人。

音韵训诂学家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年少积学，颇为自负，不肯居人之下，已是当年在京学人所熟知的了。王念孙担心他骄傲自满，贻误将来，特地叫他拜见陈昌齐，专论《大戴礼记》。后来，引之一而再，再而三，先后跑了十几趟，终于服输了。他心悦诚服地对他的父亲说：“天下没有人能象陈昌齐先生那样学问渊博啊！”

嘉庆年间，陈昌齐一再主持广州粤秀书院和雷州雷阳书院的讲席，论文教学，谆谆不倦，深得门生和学者的赞扬和尊重，人们都尊称他为“观楼先生”。侍郎温适常常对人说：“陈昌齐老先生是我们广东的‘景星庆云’、‘凤凰芝草’啊！”

二、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

陈昌齐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式举人，翌年再捷进士。跨进翰林院的门槛后，在三通馆参与了《永乐大典》的勘校。在四库馆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校，前后大约二十年。《中国人名大辞典》关于他的著作，列举了《经典释文附录》、《历代音韵流变考》、《楚辞音辨》以及《大戴礼》、《淮南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诸书正误八九种。其实，他的著作等身，上所举出的只是已经刊印的二三十卷书。乾隆四十九年由于邻居不慎于火而被烧毁的书稿，还有《二十子正误》、《朱子论仁奥旨》等多至五十多卷还没有包括在内哩。

至于他致仕归来的，为海康县、雷州府、广东省编纂的《海康县志》、《雷州府志》、《广东通志》以及他的诗文集《赐书堂集》、书法论述《临池琐语》等书无虑数百卷，又何曾计算在内呢！

最为可贵的，是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和论著。他虽然不以行医为生计，却熟谙医术药理；他虽然不以钦天监为职守，却精通天文数学。

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充当三通馆的勘校官时，独自担当地理一门的校核

工作，本来，直省（当年包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以及内蒙的部分地区）地志繁杂，不易着手，而他却审核详审，头头是道，所以人们都称赞他“生平最精地理之学”，评价是很高的了。

他为了穷究数理精蕴和钻研天文微义，曾请教于天算学家戴震。虽已积劳成病，咯血不已，而他依然如饥似渴，锲而不舍。戴震对他数学方面的成就曾作了很好的评价：“学习我的算法而能精通弧三角无形勾股的奥妙的，只有陈昌齐君一人而已！”

我们可以这么说，陈昌齐既是乾嘉年间考据、语言、文学的大师，又是精通天文、历算、医学、地理的近代科学家。他在天算方面的研究和成就比我省另一天算学家南海邹伯奇（又名邹特夫，1819—1869）还早二十年。

世传陈昌齐主讲雷阳书院时，同他的女婿蔡宠在院后散步，仰观天象而突然惊呼，说是来年大旱，老百姓的生活将不堪设想。后来，果如所说，雷地旱象严重，五谷不熟，米珠薪桂。从这一故事可见陈昌齐的星象学造诣很深，名不虚传。

《中国人名大辞典》说他“长于天算，著有《天学脞说》、《测天约术》二书”。根据梁成久编纂的《海康县续志·海康人著述书目》的记载，陈昌齐的科学论著并不止此，还有《天学纂要》三卷和《地理书钞》二卷。

他的著作，有的在道光年间刊印了，有的还没有付梓。但由于年代遥远，变乱频仍，书稿佚存于民间呢，还是已毁于兵燹匪祸？直到现在，县文物普查也搞过了，并没有找到它的吉光片羽。这就不能不令人为这位近代科学家呕心沥血几十年所获得的丰硕成果竟然杳无形影而感到惋惜了。

三、当官为民，公正廉明

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式进士进入仕途到嘉庆十四年（1809）辞官归里，陈昌齐度过了三十八年的宦海生涯。

但，他的当官运气并不一帆风顺。他做过两次考官：一是乾隆三十九年主持湖北省的乡试；二是乾隆四十年参与礼部主办的会试。以陈诗为首的湖北举人和以汪鏞为首的贡元，都是他亲自录取的“门生”。

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陈昌齐先后当过河南道和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嘉庆元年至六年，他先后做过兵科和刑科的给事中，是嘉庆九年吧，他才外出担任浙江温处兵备道。

总的来说，他活了七十八个年头，有一半时间是在北京的翰林院和温州的兵备道官衙里度过的。不过，真正“当官”的年头并不很长，而在翰林院里埋头故纸堆中却十多二十年。

陈昌齐，治学脚踏实地，学问渊博；当官公正廉明，一丝不苟。学问成就卓著，政绩也着实不错。

他身为刑科给事中，每年秋审，按刑部规定，会商前几天，须将囚犯名册送科，昌齐一收到这份囚册必然细心研勘，当决者决，不当决者提出意见，决不掉以轻心，草菅人命。他每次提出缓决之囚，至少也有十余签，对待工作总是这么严肃认真的。

昌齐性格宽厚，审案之时，从不疾言厉色，即使犯人坚不承认，仍然从容审问，让他老老实实地供出实情。嘉庆间，永嘉县有一宗因争执起衅，胞弟用屠刀抵格以致误毙胞兄一案。初时，检验与供词相符；后来，院司提讯，又说是木柴殴毙。由于供词与伤痕不一样，辗转审问，十多年也不能定案。

昌齐一上任，就亲自提审内犯：“是你打死胞兄吗？”凶手俯首承认了。昌齐说：

“你用刀杀死胞兄，尸格与供词相同，为何听信讼师的话而不承认凶器以为将来翻案呢？你这么做不过是讼师垂涎你的资财而拖延时间罢了。当年，你承认是刀伤，那么，误杀情真，上级必加怜悯，你早就可以刑满回家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呢？”凶犯听了有悔罪意，昌齐便进一步启发他：

“你今天如果供出实情，那么刀易伤人，木柴就非用力重殴不能毙命，‘误杀’与‘故

意’判刑‘轻’‘重’，大不相同，你不要一误再误了。”昌齐的话刚完，凶犯叩头说道：“大人救活了我！指使我这么说的是讼师呀！”于是昌齐便按法判刑结案，并惩办了讼师。从此，陈昌齐办案神明的故事就传遍浙江了。

有一个经历官提到一个所谓通盗犯叫朱光斗的，昌齐提审之后，发觉朱光斗是由干胞兄为海盗所掳，“私照”是海盗勒令如期赎人而发给他的，后因筹款逾期，朱的胞兄就为海盗所杀。经历在他家中搜出“私照”就自行通报，妄图领功。当权者不问底细，便要以“私通海盗”办罪。

陈昌齐审讯之后，不以为然，他极力为朱光斗辩白，说：“我们当官的不能除盗安良，以致老百姓给海盗所害，已经问心有愧了，朱光斗冒险救兄竟又冤死，是何忍心！”后来，浙江巡抚认为陈昌齐的意见正确，才纠正了原判的错误，朱光斗也不致死于非命。

陈昌齐认真办案，慎重处事，事事处处都为老百姓着想，从下面一例更看得清清楚楚。

嘉庆十二年（1807）四月，皇帝命令巴图鲁一等侯德楞泰视察闽浙部队。这人作风严厉，众所周知，官场中人之心存畏惧，岂止下级！当他来到温州，陈昌齐以下属谒见。德楞泰二话不说就盛气凌人地责问：“你乃主管沿海防务的有名官吏了。为何你管辖的沿海地方到现在还这么不平静呢？”昌齐听了不作辩白，但郑重地请他作指示。德楞泰满有把握地说：“这有何难！只要在沿海多布置兵马，日夜巡逻，不准老百姓出海，那么，海盗的水米器械无所接济，我看不过几个月，就能全部消灭干净了。”

陈昌齐说：“侯爷还没有亲临其地了解实际情况啊！闽浙沿海的老百姓一贯依靠捕鱼为生，如果禁止出海，百万渔民生计无着，因而发生变故，这罪过该由谁来负责呢？”德楞泰听后吃了一惊，他沉默了一会才无可奈何地开腔：“那当怎么办？”说罢，以困